

略論金朝統治的影響 及其歷史地位*

陳昭揚**

本文彙整學界成果，簡單論說金朝統治的影響，並觀察金朝的歷史地位。目前所見，金朝的歷史地位可由兩方面觀察，一是對漢人世界歷史發展的影響，二是在北亞民族與漢人互動關係中的作用。對漢人世界而言，金朝調整了部分中國政治演變的趨勢，也有許多金代現象成為中國往後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許多唐宋變革以後已趨隱沒的歷史現象，又因金朝統治而得活躍。對北族與漢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而言，金朝的存在具備著承先啟後的作用，既推進了北族王朝征服中國的勢態，也完成了一次結合北亞世界與南方漢人世界的示範。

關鍵詞：金朝、女真統治、歷史地位、天下秩序、北族王朝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稿委員惠賜寶貴意見，受益良多，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金朝，國號「大金」，女真族完顏部所建，西元 1115 年開國，西元 1234 年亡國，共歷 120 年。金朝疆域北界或達外興安嶺，東界接壤高麗與海，西界先沿陰山、後穿鄂爾多斯高原與蒙古諸部及夏國為鄰，南界則以秦嶺、淮河與宋朝對峙，其地可分女真祖地、舊遼全境、故宋北部等三大區域。泰和七年（1207），金朝人口估計約有 870 萬戶、5,600 萬人，女真、渤海、契丹（含奚人）、漢人（又分遼地漢人與宋地漢人）為其四大族群，女真人為統治族群，漢人為最大族群。國內多族共處，各族互動日深，文化交流頻繁。金朝大致以君主制、中央集權、官僚政治、少數統治等四大原則運行政治，前三項原則使金朝甚類漢人王朝，少數統治則是確認金朝異於漢人王朝的關鍵。

無論是研究或教學，金史一向不受注目。在研究方面，根據各種研究目錄所見，二十世紀的中文研究成果數量，唐史可得 1 萬 2 千餘種，宋史約有 4 萬 1 千餘種，明史約有 4 萬餘種。至於金史研究，即便包含中文以外成果，則僅有 4,495 種。當然，金代史實與史料的規模不如唐、宋、明三代，成果較少原為自然，但連遼史成果仍有 4,721 種，金史研究的寂杳便顯突出。¹在教學方面，以

¹ 各代研究情形，唐代詳見胡戟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內容提要〉；宋代見方建新編，《二十世紀宋史研究論著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序〉（徐規撰）；明代見徐敏，〈《百年明史論著目錄》編後記〉，《中國史研究動態》，2013：5（北京，2013.10），頁 95-96，所述著作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百年明史論著目錄》（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不過本書所收下至 2005 年刊行之論著。遼金兩代則見劉浦江編，《二十世紀遼金史論著目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編例〉。

臺灣的中學歷史教育而言，涉及金史的內容大致有二：一是金朝的對外關係，包括金與遼、宋、蒙等國的互動，二是金朝統治中的女真特色及漢化成果，如猛安謀克制、中央政府體制改革、金世宗施政等。這些描述多以漢人世界出發，或是強調女真政權的「異國風情」，或是透過金史述說宋朝國際地位的弱勢，又或是藉由漢化成果展現金朝融入中國的結局。整體而言，觀察角度影響了論述的重點。

另一方面，金史研究雖然有限，卻有不少論著可供確認某些金代現象，將會影響部分的中國及東部亞洲的歷史主流發展動向。就此所見，過於針對國際關係與女真特色的教學似乎略有不足。本文將根據新近學界成果，簡單介紹金朝統治的影響，並略窺其歷史地位。關於金朝的「影響」，就時間延續狀態所見，有些僅存在於金朝統治的當下，有些則在金亡之後繼續作用；就影響所及的空間而言，有些僅能存在於金朝統治範圍之內，有些則將擴展至金朝以外的世界。本文第二節將觀察基本上僅存在於金朝統治當下的影響，其中又以金朝統治區域為觀察範圍。第三、四、五節將介紹金亡之後還能繼續發揮較大作用的影響。進而第三、四節將探討對於漢人世界的影響，所謂之「漢人世界」，基本上將以北宋故地與遼朝幽燕之地等區域為主。其中，第三節又將就改變漢人世界的原有歷史趨勢，以及繼續強化唐宋以來漢人世界新局面等發展而論，第四節則整理漢人世界因為金朝統治而出現回歸中古歷史風貌的發展。至於第五節，則將觀察範圍延伸至漢人世界以外，尤其關注金朝在中國周邊世界秩序中的角色。相關介紹，多以現有學界共識論說，希望能以一種研究回顧式的歸納，提供讀者快速瞭解十二世紀以後東亞歷史發展中的金朝作用，並為相關歷史教學準備的補充。

二、衝擊的瞬間與影響

(一) 大規模的族群移動

在中國史的角度中，金朝的存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異族統治」的形貌，此一特徵也是觀察金朝歷史地位的基礎。不過在展現「異族」色彩之前，金朝建立將先對當代帶來第一波的衝擊——戰爭。金朝帶來的戰爭，加上侵宋時對於江南的深入作戰以及往後對於西北的經略，涉及地域將達金朝盛世的所有統治範圍，以及蒙古草原與長江流域。戰爭造成大量傷亡，也使戰地人戶大幅移動。就金朝統治範圍所見，在局勢稍緩的大定（1161-1189）初年，其人口估計僅為戰前的七成左右，約有 500 萬戶，同一地域在遼宋盛世期間則有 732 萬戶。²除了死亡外，人口萎縮的原因也含外徙，皇統二年（1142）金宋和議（宋方稱「紹興和議」）簽訂前後，估計約有 500 萬人左右的淮河以北漢人移居南宋。³

在漢人大量死亡與南徙的同時，第二波金朝統治的衝擊也出現了，大量的北方族群開始移居中原。南遷的北族以女真人為主。金初，女真人僅分佈於今日中國東北一帶。隨著疆域的擴大，為了控制新佔領區，金朝開始南遷女真人，泰和七年（1207），金朝全國女真人估計約為 771 萬餘人，其中有 350 至 360 萬分佈於長城以南，在其中又有約 300 萬人分佈於今日河北、山東一帶，其餘則

² 大定初年之金朝人戶，今有 300 餘萬戶的統計數字，見元·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46〈食貨一〉，頁 1035，但此數不含未著籍的流民與抗金漢人。大定初年金朝人戶估算，詳參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遼宋金元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頁 374。

³ 北人南移數量估算，詳參吳松弟，《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 134-137。

多居住河南地區。⁴女真人的南遷改變了華北的族群分布，也使得族群關係成為金朝統治與漢人社會重要的時代課題。雖然進入中原的女真人數量相對有限，但因金朝的管理政策，許多層面將開始干擾華北漢人原有的生活。

（二）女真人的南遷

女真人南遷對於華北漢人社會的干擾，首先是對漢人原有生活空間的排擠。女真人南遷，金朝將以猛安謀克為組織，並授予田地使之自耕自食。大定 23 年（1183）前後，據研究，猛安謀克可能佔有華北約 100 萬頃左右的田地，而金代的華北墾田總數估計約有 160 萬頃，如此則女真人將佔六成之地。⁵此數甚大，但非無據，許多其他紀錄也顯示女真佔地數量之驚人。⁶授田期間，漢人的生活空間遭受排擠，進而排擠過程又非一次完成。女真南遷高峰期為太宗至海陵王時期，前後近 40 年，期間較大規模的移民潮約有

⁴ 劉浦江，〈金代猛安謀克人口狀況研究〉，頁 192，文收氏著，《遼金史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頁 177-194。

⁵ 此一數據得自許多推論。首先，華北的猛安謀克墾田數，韓茂莉曾以人口比例為準，推得猛安謀克在中原約佔田 99 萬 5 千頃；張博泉則以猛安謀克的數量比例為準，推得在中原共佔田約 108 萬 8 千頃。兩氏所論均見中原猛安謀克佔田約當百萬頃上下。韓、張數據與論證，見韓茂莉《遼金農業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167、195、216-217；張博泉，《金史論稿》第二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頁 244。再者，金代的華北墾田數，目前已無資料，但因大定末年金代農業已經復甦，繁華略近北宋盛世，故可以北宋盛世數字對照。據畢仲衍《中書備對》所記，扣除東南九路，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的北方墾田數有 166 萬頃，見馬端臨，《文獻通考》（萬有文庫十通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4〈田賦四〉，頁 59-60。由於現今殘留的金朝特定區域墾田面積並不少於北宋盛世，故總體而言，金朝盛世的墾田規模應與北宋盛世相當。

⁶ 相關討論詳參劉浦江，〈金代土地問題的一個側面〉，文收氏著，《遼金史論》，頁 215-241。

三波，每波皆有巨幅的土地調整。⁷稍後，由於原授田地的外流，加以兼併惡化，部分女真人因而貧困化，金朝於世宗以後遂有一連串的土地清理措施，意圖重新分配土地安養女真人，時稱「括地」、「括田」。「括地」措施前後實施約40年，初期規模尚小，而後轉為劇烈，承安五年（1200）竟有「凡得地三十餘萬頃」的紀錄。⁸授田與括地將長期嚴重地困擾著金代漢人的生活。

再者是對漢人社會秩序的侵擾。最初的金朝規劃，南遷女真人均以部落為單位整批移動，他們被安置於鄉間而以村寨型態嵌入漢人農村中，也不受漢式州縣體制管轄而自配官署治理。⁹整體來看，此時的華北鄉間猶如馬賽克拼畫，女真人的分布格局基本為集中於河北、山東、河南之地，分散於鄉間，最後集中於村寨之中，理論上漢人與女真人擁有的片塊分野清晰，似乎不會相互干擾。同時為防多事，金朝亦以調整土地區界隔離兩造、壓制貴族非法強佔土地、開放通婚增進交流等方式消弭雙方衝突。¹⁰此外，女真人雖然是金朝的國族，但金朝也有法律規範保障漢人權益。只是在現實中，女真人在族群政策與法律中的優越地位還是給予部分猛安謀克與貴族侵擾漢民的機會，而奪取田產與侵犯身

⁷ 劉浦江，〈金代猛安謀克人口狀況研究〉，頁187-198。

⁸ 元·脫脫，〈《金史》，卷93〈宗浩傳〉〉，頁2074。括田措施，詳參劉浦江，〈金代土地問題的一個側面〉，文收氏著《遼金史論》，頁215-241。

⁹ 宋·張棣著，傅朗云輯注，〈《金虜圖經》〉（書收李澍田主編，《金史輯佚》，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頁82，〈屯田條〉，中言：「（女真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此處斷句略有修正。）

¹⁰ 元·脫脫，〈《金史》，卷88〈紇石烈良弼傳〉〉，頁1951；卷97〈裴滿亨傳〉，頁2144；卷9〈章宗一〉，頁218。金元通婚現象，參見陶晉生，〈金元之際女真與漢人通婚之研究〉，文收氏著，《邊疆史論集——宋金時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77-86。

家財產乃是兩種常見的侵擾行為。前者牽連極廣，為侵擾行為的主體；後者多是個案，但也令人印象深刻。¹¹而且問題不僅在於侵犯當下，稍後對簿公堂，地方官員又常屈就權勢偏袒女真，此更加深漢人不滿，「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的現象便時有所見。¹²雖然這些侵擾僅會發生在女真人與漢民雜居之處，許多漢人因為並未鄰近女真人而無這類經歷，但就算是遠方的偶發事件，有時也將以口耳相傳、以訛傳訛的方式點滴滲入漢人社會的集體記憶，構成族群仇視的深層基調。一旦朝廷無力控制，如金末，漢人不免伺機屠殺女真人以為宣洩。

（三）族群政策的施行

金朝又有一些對漢人而言的不當措施，如強制漢人薙髮左衽、濫簽漢人為兵、徵收各式雜稅等。為達目標，金朝常以殘暴手段強力執行，從內容到執行皆令漢人反感。¹³最終，包含授田與括地，這些政策都將是金朝整體族群政策的一環。

基於入金先後與忠金程度，金朝在初年曾分全國人民為女真、渤海、契丹、「漢人」、南人五等。¹⁴其中「漢人」乃指居於舊

¹¹ 女真人的仗勢欺人與侵犯漢人自家財產，參見金·元好問撰，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卷20〈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頁461，其中亦見當時官員屈就權勢之狀。高利貸行為，見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濟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8），頁393-396。

¹² 元·脫脫，《金史》，卷9〈章宗一〉，頁218；卷86〈李石傳〉，頁1914。

¹³ 薙髮左衽，詳參劉浦江，〈金朝的民族政策與民族歧視〉，頁61-63，文收氏著，《遼金史論》，頁58-86。簽軍之令，詳參王曾瑜，《遼金軍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1），頁238-243。雜稅徵收，詳參劉浦江，〈金代雜稅論略〉，文收氏著，《遼金史論》，頁279-303。

¹⁴ 金初族群等級，詳參張中政，〈漢兒、簽軍與金朝的民族等級〉，《社會科學輯刊》，1983：3（瀋陽，1983.6），頁99-102。

遼全境之遼地漢人，南人則為居於故宋北部之宋地漢人。¹⁵往後，女真地位依舊尊榮，被女真視為「本同一家」的渤海人，地位也是大致穩定，其餘族群則有變動。¹⁶首先，契丹與同屬之奚人於世宗之後因為撒八之亂而遭貶抑。¹⁷再者，遼地漢人與宋地漢人則漸融合一體。宋地漢人由於數量龐大，學術素質遠勝遼地漢人，又因不再堅持反抗金朝，且獲海陵王的特意拔擢，於是海陵王之後開始活躍政壇，其地位逐漸凌駕遼地漢人之上，世宗之後更為金朝女真人以外官員的主體。¹⁸整體而言，金朝的族群政策在海陵王後已不如初期嚴峻，世宗之後大致僅存女真人與非女真人之別，

¹⁵ 「遼地漢人」，即指居於原遼朝統治區內之漢人，金代又習稱「漢兒」、「漢人」、「北人」。另因遼代漢人主要居於燕雲地區，是以金代亦常以「燕人」為稱。原本歷史敘述理當回歸時代用語，但「漢兒」、「漢人」、「北人」等語，非但今日已有慣用意涵，金代亦仍有其他用法。金代用法部分，如「漢兒」亦能為所有漢人之總稱，「北人」也常是北亞族群或女真人之代稱。至於「燕人」或今日學界常用之「燕雲漢人」，則無法涵蓋來自遼朝但卻居於燕雲以外地區的漢人。為求概念完善，本文便以「遼地漢人」指稱居於舊遼全境之漢人。至於原居於故宋北部的金代漢人，金代中葉以前常以「南人」為稱。但「南人」之意亦是多元，金代有時也為所有漢人之總稱，有時則為南宋人之代稱。為與「遼地漢人」用語對照，本文便以「宋地漢人」指稱金朝治下居於淮河秦嶺以北故宋舊域之漢人。諸多考量，尚請讀者諒察。

¹⁶ 渤海人政治地位變化，詳參外山軍治，〈金朝統治下的渤海人〉，文收氏著，李東源譯，《金朝史研究》（牡丹江：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8），頁95-119；劉浦江，〈渤海世家與女真皇室的聯姻〉，文收氏著，《遼金史論》，頁87-108。

¹⁷ 契丹人之政治地位變化與入金活動，詳參外山軍治，〈金朝統治下的契丹人〉，文收氏著，李東源譯，《金朝史研究》，頁50-94；夏宇旭，《金代契丹人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¹⁸ 各族之政治地位，詳參前引陶晉生，〈金代的政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4（臺北，1969.12），頁567-593。遼地漢人與宋地漢人的地位升降，詳見陶晉生，〈金代的政治衝突〉，頁582-591，文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3：1（臺北，1971.6），頁135-161；陳昭揚，〈金代漢族士人的地域分布——以政治參與為中心的考察〉，頁114-118，文刊《漢學研究》，26：1（臺北，2008.3），頁103-135。

後者又常被統稱為「諸色人」。¹⁹族群等級政策的淡化，促成了諸族政治認同的統合，漢人也與女真統治階層互動日增，共識漸成。世宗以後，絕大多數的漢族士人已視金朝為祖國。²⁰不過其中仍有隱憂。一者族群等級政策尚存，各種國家規定的族群差別待遇依舊。再者，金朝君主與女真統治階層多存歧視心態，既常以「本國人」、「本朝人」、「自家人」稱呼女真人，也多見刻意分別女真人與其他族群的言行。²¹相對而言，類似海陵王之強調「天下一家」的女真高層人物頗為罕見，保障女真優越地位總是女真統治階層的主流意見。²²女真統治階層的歧視心態其實是種不安的展現，相對於漢人的龐大人口及其於漢式體制中的強勢競爭力，女真有其弱勢的一面，但對漢人而言，卻不易就此合理化歧視帶來的苛虐，不安與歧視也一直是金朝族群統合的障礙。

同時，隨著諸族混居華北與通婚的開放，華北社會也出現了規模頗大的文化交流。一方是女真人的「漢化」，另一方則是漢人的「女真化」或「胡化」，在服儀禮俗、生活舉止、乃至於學術文

¹⁹ 閔興潘，〈論金代的「諸色人」——金代民族歧視制度化趨勢及其影響〉，《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9：4（臨汾，2012.7），頁62-66。

²⁰ 陶晉生，〈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文收氏著，《宋遼金史論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13），頁455-478。

²¹ 歧視心態的分析，詳見劉浦江，〈金朝的民族政策與民族歧視〉，頁75-77。「本國人」等語彙的整理，見閔興潘，〈論金代的「諸色人」——金代民族歧視制度化趨勢及其影響〉，頁63。

²² 亦有類似海陵王態度之女真高層，如唐括安禮。唐括安禮（？-1181），本名幹魯古，史稱「好學，通經史，工詞章」，仕至尚書右丞相。《金史》本傳曾留下兩則唐括安禮與世宗的爭辯，時間約在大定十三年（1173）至大定十七年（1177）之間，首次論女真與漢人，後次所論則為女真與契丹人的關係，立場均是漢人、契丹「今皆一家」、「皆是國人」，「不宜有分別」。不過辯論之際，世宗態度清楚，既稱「女直漢人其實則二」，又言「契丹豈肯與我一心」，兩度爭辯皆以唐括安禮遭斥告終。事蹟詳見元·脫脫，《金史》，卷88〈唐括安禮傳〉，頁1966-1966。

化上，漢人與女真人開始彼此仿倣。²³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種交流仿倣的紀錄中，漢人的「女真化」主要集中在基層百姓，總是透過服儀禮俗等生活行為展現，其中有部分又為朝廷強制推動所致。至於女真人的「漢化」則較全面，初由上層貴族啟動，稍後快速蔓延至居於漢地的猛安謀克戶，涉及層面從俗民生活到菁英學術皆有，整體而言較多女真人的主動追求，朝廷則常有抑制此一趨勢的措施。

戰亂、金朝統治、女真人南遷，這些衝擊所帶來的效應，有些在金亡以後繼續發揮作用，甚至改變了原有的歷史發展趨勢，有些目前則尚難確認能否繼續影響。以下觀察可能會改變原有歷史發展趨勢的金代現象。

三、新局面的產生

金朝的出現，影響了一些原有的歷史變動節奏與發展方向。部分影響將加速原有趨勢的變化速度或改變原有的發展方向，部分則有延遲變化或「復古」的效果，前者催生了新局面，後者則復甦了古風貌。對中國史而言，新局面主要產生在兩方面，一是對中國政治運作方式的改造，二是對中國人文活動空間格局的形塑，前者主要表現在「制度簡單化」與「運作殘暴化」的推進，後者則有造就政治中心北移與加速北南區域經濟落差的表現。當

²³ 漢人與女真人的互相仿倣，詳參陶晉生，〈遼金兩代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文收氏著，《宋遼金史論叢》，頁397-416。女真或北族風俗對漢地的影響，詳參宋德金、史金波，《中國風俗通史：遼金西夏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中編〈金代卷〉各章所述。女真人「漢化」的歷程，詳參劉浦江，〈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滅亡〉，頁246-253，文收氏著，《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35-273。女真人的漢學，詳參王明蓀，〈含英咀華：遼金元時代北族的漢學〉（新北市：花木蘭出版社，2012）。

然，這些新局面絕非金朝獨力完成，唐、宋，以及後續蒙元亦有貢獻，不過目前所見，金朝作用亦是明確。此外，又有一些新的學術文化發展亦是發生在金代，如雜劇的興盛、新道教的崛起、中醫新流派的創生等。然而這些現象似乎自有演化脈絡，雖然其生成多少與金朝建構的環境條件有關，但不易確認乃由金朝統治直接促成，成形於金代比較是種水到渠成的結果。²⁴本節將集中觀察因為金朝統治而產生的中國歷史新局。

（一）政治制度的改革

影響漢人世界往後的政治活動之前，金朝先是受到漢人世界的影響。金朝開國前夕，女真完顏部的政治體制極為簡樸，組織架構簡單、人員與職務的權責分工模糊，部落領導者與統治集團、部民之間的關係也是相對平等。快速擴張後，面對著驟然取得的龐大佔領區，舊體制已難因應新環境。最初，金朝有意將新征服人民編入女真舊慣的猛安謀克制，但當征服遼朝漢人居地後，此法不為漢人所喜，金朝遂是仿襲遼朝作法實施兩元體制。直至佔領宋地之初，金朝皆以因地制宜精神添建各式機制。於是太祖、太宗時期，中央採女真舊有之勃極烈制，地方則因人設制，以猛安謀克管理女真人與部分契丹人，以州縣治漢人。太宗晚年，經由新環境的需求與政爭的誘發，首波大規模的制度改革開始啟動，熙宗在位後到達高峰，史稱「天眷改制」。²⁵「天眷改制」主

²⁴ 雜劇創作、新道教、中醫新派流等活動，過往曾有金朝不重儒士或漢族士人反抗異族統治，遂有大量士人投入而得興盛的說法。不過此說多有不符現今已知之金代實情，事實上金朝甚重儒士，海陵王後漢士也已順服金朝。外部刺激說的立論恐有不足。若無新論點，此三種活動源生於金的原因，可能還是需從三種活動內部的演化脈絡探詢。

²⁵ 雖然「天眷改制」大行於熙宗即位之後，但在太宗末年，已是有所構思並展開部分改革。詳參楊保隆，〈試談金代廢除勃極烈制度的最初動因〉，《社會科學戰

要內容有二，一是調整中央政府架構，以三省制取代勃極烈制，二是整編官員管理制度，混亂的入仕管道與遷轉制度將被整編為一套授官系統，其操作原則與細部規範也是仿襲唐宋。金朝政治制度的面貌「漢化」了，君主專制原則取代了宗室共議傳統，官僚政治逐步成形、組織分工明確。海陵王弑篡熙宗後，為求穩固權力基礎並實現獨攬大權的理想，第二波政制改革展開，史稱「正隆改制」。相對於「天眷改制」，「正隆改制」的改革幅度較小，卻使制度更加符合當時所需，核心表現則是將三省制改為尚書一省制，並以廢除行臺尚書省、世襲萬戶等措施強化中央集權。

「正隆改制」後，君主制、中央集權、官僚政治等三大漢人風格濃重的政治運作原則就此確立。就《金史》〈選舉志〉、〈百官志〉或《大金集禮》的記載所見，金朝政制的整體架構貌似漢人王朝。同時，因為熙宗與海陵王時期的政爭，高層統治成員已由女真權貴大致壟斷轉為開放多族參與。雖然此舉無法改變金朝政治結構的基本格局，女真權貴仍是統治核心，但已使更多漢人得以參政，並有少數也能進入決策圈。²⁶漢人的加入使得政壇上的「漢風」更加瀾漫。

另一方面，女真統治階層並非全然仿襲漢制，改制本質既可說是「漢化」，也能說是「官僚化」。²⁷引用漢制本有現實動機，除了爭取漢人認同以利漢地征服，也能符合女真統治需求。相較於

線》，1994：1（長春，1994.2），頁185-192；王曾瑜，〈金熙宗「頒行官制」考辨〉，文收姜錫東、李華瑞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6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5），頁286-295。

²⁶ 金代官員的族群分布，詳參陶晉生，〈金代的政治結構〉的討論。

²⁷ 連同政治文化的仿襲，Peter K. Bol（包弼德）認為「文明化」（civilization）更能說明此一過程的本質。詳參 Peter K. Bol, "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 2 (Dec., 1987), pp. 461-538。

女真舊慣，漢人制度更為便於管理大型國家。又因所處時空已非所引漢制原先的環境，改制之際，女真統治階層也將因時制宜。中國政治制度發展至兩宋，君主的權威已經高度提升，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關係有中央集權的傾向，管理規章繁密嚴謹，運作之際強調相互制衡以求決策執行的完善。「天眷改制」後，金朝繼續提升君主權威與集權中央，卻裁革了相互制衡的程序，其三省制之中書、門下兩省職務多虛缺不除，唐宋三省制原有之商議決策的操作原則已被大幅縮限。「正隆改制」更將變化推到極致，虛閒的中書、門下兩省因此罷廢，此後君主掌決策，尚書省掌執行，流程高度簡化，制衡君主的機制也遭革除，新體制的核心精神將以貫徹君主旨意為依歸。²⁸陶晉生便明確指出，在承襲漢制之餘，金朝也將制度「簡單化」。加上統治手段的「殘暴化」，兩大變革除了本族傳統的增添外，更多是配合時局而創，考量重點又與提升君主權威、強化統治效率有關。稍後，金代變革成果也將透過元朝轉交給明清兩代，傳統中國政治活動風格將有調整，現下所見的明清專制或許不僅只是唐宋餘緒，也有金元新造。²⁹陶先生的說明，稍後學界已有許多充實，目前大致已能得知金朝的君臣關係型態與中央政府體制對於後世的影響。³⁰因此現今如欲探究中國

²⁸ 金、宋兩代三省制的比較，詳參吳鳳霞，〈金代尚書省若干問題探討〉，頁208，文收于志耿、王可賓主編，《遼金史論集》，第8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頁206-216。金代一省制的運作原則，詳參陶晉生，〈金代女真統治中原對於中國政治制度的影響〉，頁117，文收氏著，《邊疆史研究集——宋金時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111-126；屈文軍，《遼西夏金元史十五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68-70。

²⁹ 陶晉生，〈金代女真統治中原對於中國政治制度的影響〉，頁111-126。

³⁰ 蕭啟慶，〈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發展影響的省思〉，頁74-77，文收氏著，《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1999），頁61-82；姚大力，〈論蒙元王朝的皇權〉，文收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第15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頁282-341；

政治發展，已是不易排除對於金朝統治影響的認識。

(二) 人文地理格局的改造

秦代以後，中國統一王朝的都城多是建於今日長安、洛陽、開封三地，位置皆在黃河及其支流的南側。金代以後，北京首次成為都城。最初金朝乃以上京（今黑龍江阿城縣）為都城，然而上京雖為女真祖地中心，在熙宗天眷二年（1139）確立統治華北之後卻為全國極北，漢地控制已是鞭長莫及。進而許多場合也生不便，如高級官員的銓選，唐代以後皆由中央政府負責，熙宗承繼唐宋故事建立官員管理機制後也是如此，但在國都為上京時，每次改任，四方官員皆要遠赴北鄙受命，行程勞苦。因此皇統八年（1148）金朝便以「上京僻遠」，命官員赴燕京擬注應調即可。³¹燕京，即今日北京，其地位於熙宗時期逐漸明朗，並於海陵王確立為國都之時改稱中都，時為貞元元年（1153）。基於金朝疆域形勢乃是東北斜向西南的長形格局，而中都恰於上京至南京（今河南開封）之國土長軸的中心，遷都可使金朝領土管理更為合理。³²金亡之後，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北京再度成為都城，時稱大都。³³往後明朝、清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將跟隨，自金代起算，北

張帆，〈回歸與創新——金元〉，頁307-310，文收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289-385。

³¹ 元·脫脫，《金史》，卷54，〈選舉四〉，頁1197。

³² 上京與中都之形勢、地位變化及其影響，詳參徐秉諭，〈從「內地」到「邊區」——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變化〉，《臺大歷史學報》，39（臺北，2007.6），頁185-232；余蔚，〈完顏亮遷都燕京與金朝的北境危機——金代遷都所涉之政治地理問題〉，《文史哲》，2013：5（濟南，2013.10），頁124-139。中都建立經過及其歷史地位，詳參宋德金，〈金中都的歷史地位〉，文收氏著，《遼金論稿》（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頁198-211。

³³ 元代大都之建，詳參陳高華，《元大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本書後與陳高華、史衛民合著之《元上都》合刊一書重印發行，即陳高華、史衛民，《元

京建都已歷近九百年。北京成為國都，代表著中國政治重心的北移。就金朝而言，中都周邊地區乃是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但在元代以後的中國北南統一時期，由於北宋以後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已經南移，建都北京卻使國家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分離，或有不和之處。只是就金、元、清的疆域格局所見，定都北京又有道理，此地將可兼顧本族故地與新佔漢地，定都北京可謂為北族王朝新型疆域格局的結果。³⁴

中國經濟重心的加速南移也是金宋對峙期間重要的歷史發展。唐代時期，長江流域經濟日益發達，即便黃河流域經濟亦能緩步成長，但已有北消南長之勢。北宋時期，北消南長之勢加速，但因當時政治中心的位於北方與北南物資的密切交流，北南落差猶可略為彌縫。12至14世紀，北南落差急遽拉大，北弱南強之態明顯出現，往後中國經濟的基本地域格局自此確立。目前所見，包括稍後的蒙元統治，金元兩朝對於淮河以北區域經濟的主要影響在於佔領過程帶來的戰亂，而金朝統治期間又增添了北南隔絕的問題。³⁵相較於南方在兩宋統治下的長期承平，北方承受了12世紀中葉與13世紀前半段等兩次各約50年左右的金宋與金蒙交戰的摧殘，兩次戰爭均是瞬間摧毀北宋與金朝長期休養的努力。加上元末戰爭，自宋至明，北方不斷經歷著發展與破壞的循環。北

代大都上都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³⁴ 中國政治中心轉移的意義，參見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編，史衛民等譯，陳高華等審稿，《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導言〉，頁19-20。屈文軍則認為，金代以後，北京將是「版圖不想侷限於漢地的真正大一統王朝的都城首選之地」，見氏著，《遼西夏金元史十五講》，頁68。

³⁵ 金代經濟發展的整體評估，及對學界說法的反省，詳參蕭啟慶，〈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頁4-9，文收氏著，《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8），頁1-22。

南隔絕亦為金朝統治的間接影響之一，此狀對於當時華北經濟的作用在於妨礙南方資源往北輸送。雖然無論北南，雙方的經濟活動均因規模萎縮而弱化，但因南方生產力仍處上升階段，北南隔絕反而阻止了南方物資外流，南方影響相對有限。北方卻非如此，隔絕之後，北方經濟難得南方資源挹注，也不易與興盛的南方經濟共鳴，北南隔絕終使北方更為消沈。換言之，12、13 世紀華北經濟的不振，與其說是金朝統治策略不佳，不如說是戰亂衝擊與北南隔絕的影響。此後，元代至近代中國的北南經濟落差總難弭平，也終有「經濟上北依賴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基本格局。³⁶

四、古風貌的復甦

（一）北流與南流

西元 1977 年，竺沙雅章曾經指出在宋元時代，中國歷史有「北流」與「南流」，即「北宋—金—元」與「北宋—南宋—元」的兩個潮流，但未有太多說明。³⁷近年來，李治安則指出學界關注的「宋元明過渡」(Song-Yuan-Ming transition)、「宋元變革」乃至於「唐宋變革」，其實多與中國北南地域差異有關。由於中國幅員廣闊，各地民情多有特色，如以秦嶺、淮河為界，則見其界的北與南，兩地之內頗具同質性，彼此則多相異處。此間差異，更因遼金元三朝與宋朝共 317 年(960-1276)的對立而更行拉大。最終，即便元朝統一中國，北南鴻溝已非一時可弭，落差需至明代中葉始得逐步整合。進而宋朝與遼金元對立之時，或是中國第二個「南北

³⁶ 李治安，〈元代與明前期社會變動初探〉，頁224-225，文收氏著，《元史暨中古史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223-245。

³⁷ 竺沙雅章，《征服王朝的時代》，頁353-354，書收伊藤道治等著、吳密察等譯，《中國通史》（臺北：稻鄉出版社，1990），347-511。

朝」時期，此說不僅有史實依據，「北朝」、「南朝」的稱呼也是遼宋金元時期的常見用語。³⁸

「第二個南北朝」也是1960年代以來部分中國遼金史研究者的主張，如陳述、張博泉等便有如此意見。³⁹即便早期此說的出現多少又與中國的學術環境有關，⁴⁰但是近年不少研究卻也陸續提醒分論北南方能精確掌握此時的歷史發展。⁴¹不過，「北」、「南」之義有待辨明。細觀諸家論述，可見「北」與「南」的範圍常受到觀察對象的不同而有變化。政治領域的討論，北南界線常為政權疆界。由於漢人政權並無多元體制，政治制度常是全國一體，可以分別北南的時代便也常是北南分治之時。但在政治領域以外的討論，北南界線總以秦嶺、淮河為界。因此在10至12世紀初葉，以政治為觀察對象，如將遼朝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則遼朝勉強可屬北流一脈，但如以政治以外範疇為觀察對象，則中國史的北南論述重點恐怕更應置於北宋內部之北與南。由於仍有商榷餘地，李治安也強調並不執意使用「南北朝」一詞，只是希望讀者藉由此詞更加注意存在於中國近古歷史的北南兩線發展。

³⁸ 李治安，〈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文收氏著，《元史暨中古史論稿》，頁246-274。

³⁹ 陳述，〈遼金兩朝在祖國歷史上的地位〉，序頁2-3，文收同氏主編，《遼金史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序頁1-9。張博泉，〈金史的研究與思考〉，頁442，文收張志立，王宏剛主編，《東北亞歷史與文化：慶祝孫進己先生六十誕辰文集》（瀋陽：遼瀋書社，1991），頁438-444。相關學界意見說明，詳見陶晉生，〈金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頁418-419，文收氏著，《宋遼金史論叢》，頁417-438。

⁴⁰ 劉浦江便指出，力倡宋遼金時期為中國第二個南北朝之說，「與其說是為遼金史爭正統，毋寧說是為遼金史研究者爭名分」。見氏著，《遼金史論》，〈自序〉，序頁2。

⁴¹ 除了前引李治安研究外，更早的提示詳參蕭啟慶，〈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

考量觀察範圍的整齊，也許西元 1127 至 1276 年的 150 年間方是一次漢人世界徹底分別北南的時期，竺沙雅章之北南兩流也是如此說明。此時的北與南因為政治對立而得獨力發展的空間，北方之金朝、蒙元將與南方之宋朝對峙，其中三分之二強的時間又由金朝代表「北方」。對立中，北方將因女真、蒙古的統治而拉開了原有中國的北南差距。

（二）北流中的古風貌

配合整體的中國歷史發展，可以發現秦嶺淮河以北地區在金朝的統治之下，扣除了政治領域及部分學術文化方面的新發展後，剩餘的現象多未延續唐宋變革以後的新趨勢，而是回歸到唐宋變革以前的面貌，呈現著「逆退」或「復古」的發展型態。⁴²此時，作為「北流」代表的金朝，不僅是新局面的開創者，也是古風貌的守護者。

經濟方面，漢人世界最為基礎的農業在金朝的大力振興下已有復甦，表現尚可，然而多被學界視為經濟發展指標性產業的礦冶業，卻已不復北宋「煤鐵革命」盛況。⁴³商業活動亦或如此。目前金代的商業資料不多，但知承安元年（1196）中都都稅務使司歲獲 21 萬 4,579 貫的商稅。⁴⁴同為盛世首都，北宋熙寧十年（1077）

⁴² 唐宋變革說及此時之歷史變局，詳參內藤湖南著，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文收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0-18；邱添生，《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文收鄧小南、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5-71。

⁴³ 蕭啟慶，〈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頁4-8。

⁴⁴ 元·脫脫，《金史》，卷49，〈食貨四〉，頁1110。又，金代商業研究專著，目前有王德朋，《金代商業經濟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之第一章〈學術前史與研究現狀〉整理了最近的研究成果。

東京商稅院歲收則得40萬2,379貫。⁴⁵不考量物價水準，或知由宋至金北方商業的衰退。加上土地國有程度的大幅攀升、國家更加積極地大規模干預經濟活動等現象，皆使金代貌似重回中古時期之以農為本而由政府主導財富分配的局面。社會方面，金朝統治下的北方出現了若干門第社會的特徵，例如奴隸制與身份等級制的大行、社會流動的趨緩、族群或家世等血緣因素之作用的提升，整體社會遂是階層森嚴而有中古風貌。文化方面，金朝治下也有教育環境退化、士人群體規模萎縮、整體學術重藝文輕儒史、儒學則專重漢唐注疏之學而不及北宋新儒學等現象，此時之菁英文化也多中古士人文化的遺痕。⁴⁶

古舊風氣的復甦與持續，其來源有二。一是淮河以北漢人活動原有的特質。自中古以後，伴隨南方力量的茁壯與挑戰，對應而出的北南異俗現象便一直是各時代的議題。各期歷史的新舊變革，有時又以「北舊南新」的勢態呈現。⁴⁷於是所謂之「舊」，實為北方的地域特徵，宋金對立之時，這些北方特徵便因獨立發展而得現形機會。二是作為金朝政權本質之北族王朝性格的影響。⁴⁸遼金元等北族王朝，其統治族群原居漢地以北，他們部分的活動

⁴⁵ 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220。

⁴⁶ 社會與文化發展，詳參蕭啟慶，〈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頁9-16。

⁴⁷ 隋唐時期諸狀說明，詳參李治安，〈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頁247-256。北宋時期，則有「新舊黨爭」議題曾有類似解釋。

⁴⁸ 「北族王朝」一詞，其指涉範圍略同於「征服王朝」。姚大力曾指出，「北族王朝」相較於「征服王朝」，姑且不論政治因素，因為漢人文獻也常以「北族」、「北人」稱呼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此詞也許是一個「更貼近史料也更為平實」的稱謂。詳參姚大力，〈論蒙元王朝的皇權〉，頁282-283。以下行文，除了專述「征服王朝說」理論之處須以「征服王朝」為言外，其餘皆以「北族王朝」作為北亞民族所建王朝的總稱。

型態常因環境條件所限，尚未達到同時期漢人世界的精緻或複雜。當進入到漢人世界後，較為簡易的活動型態便顯古樸。稍後採借漢法之際，或因添加了本族的「古樸」元素，或因採借了類型相近並且較為簡易的早期漢人元素，最終成果遂有古風。以選官制度為例，在進入中原之前，北族王朝都具有強烈的「家產制」(patrimonialism)色彩，除了視國家為領導者家族的共有財產外，領導者家族也常結合數個核心家族以強化政權基礎。⁴⁹進入中原後，面對各種漢式的選官制度，脫胎自封建時期世官制度的門蔭制度，其家世取人原則便令北族統治階層頗感親近而重用，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便指出，門蔭制度乃是征服王朝溝通本族舊制與漢人傳統之間的樞紐。⁵⁰在漢人世界，門蔭制度的功能於唐宋時期原已受到縮限，已非高級官員的主要入仕管道，但在北族王朝的重視下，其功能再度強化，既與其餘的家世選人管道共構而為北族統治階層的重要來源，也使數百年前曾經活躍漢地的「門第社會」風氣獲得激振。

另一方面，古風之中其實仍多新貌點綴。學術文化方面，宗教與俗民文化自是存在著大量的新時代特質。經濟方面，金代也是承繼了一些北宋以來的新元素，如貨幣發行。金朝既曾大量發行紙鈔，更於承安二年(1197)以白銀鑄造了「承安寶貨」，前者使得金代的貨幣政策串連在宋元之間的基本趨勢之中，後者更是中國首次的白銀鑄幣，北宋以來的白銀貨幣化發展進入新階段。⁵¹

⁴⁹ 蕭啟慶，〈元代四大蒙古家族〉，頁141，收於氏著，《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141-230。

⁵⁰ Karl A. Wittfogel(魏復古)& Feng Chia-Sheng(馮家昇)，*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pp. 460-461.

⁵¹ 金代紙鈔發行的過程與意義，詳參高橋弘臣著，林松濤譯，《宋金元貨幣史研究——元朝貨幣政策之形成過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北宋以降的

社會方面，科舉亦為金朝所重，也是金代漢人入仕的最佳管道，大舉開科與各種禮遇的繼續保持，漢族士人亦是趨之若鶩，北宋已然成形的科第社會結構依舊深嵌於金代北方的漢人社會中。科第社會及其延伸的社會風氣，相關情狀至今仍是豐富保存於金代漢族士人的紀錄，如果掩蓋這些紀錄的時間敘述，其中熱衷舉業、競奔科場的描述偶有令人難分宋金之感。換言之，「北流」的古風成分，其分布情形將因所在領域不同而有差異。

延續狀態亦是因領域而有差別，部分領域的「古風」將於蒙元時期受到南方現象的席捲而消散，部分則因蒙元環境的配合而反趨蒼勁。前者如儒學，程朱理學自晚金開始大舉北傳後，蒙元時期已為北方儒學的主流，北方的整體學術風格也將因此連動變化。⁵²此狀或因蒙古統治階層對於漢人世界的文化發展較無控制興趣，學術文化變遷多由漢人原有趨勢決定。至於社會領域中的諸多現象，或許需要配合統治，似乎較易受到政治考量的牽動，「北流」的延續略更持久。如階層等級的嚴峻與身份轉換的阻滯，在族群等級制與戶計制的施行下，南方反遭波及，戶計制甚為明朝

白銀貨幣化過程，參見葛金芳，《宋遼夏金經濟探研》（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頁464-467。

⁵² 金元北方儒學的發展，詳參吉川幸次郎，〈朱子學北傳前史：金朝と朱子學〉，文收宇野哲人先生白壽祝賀紀念會編，《宇野哲人先生白壽祝賀紀念東洋學論叢》（東京：宇野哲人白壽祝賀紀念會，1974），頁1237-1258；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文收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17-224；Hoyt C. Tillman（田浩），〈金代儒教：道學在北部中國的印跡〉，文收《中國哲學》編輯部編，《中國哲學》，第14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頁107-141；周良霄，〈程朱理學在南宋、金、元時期的傳播及其統治地位的確定〉，文收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文史》，第37輯（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39-168；魏崇武，〈金代理學發展初探〉，《歷史研究》，2000：3（北京，2000.6），頁31-44。

所襲而以戶役法的形式繼續存留至明代中葉。⁵³

五、天下秩序的重構與影響

(一) 從「破片化」局面到新型的天下秩序

天寶十四載（755）冬，安史之亂爆發。短期而言，安史之亂終結了大唐盛世，長期所見，安史之亂標示著新時代的起點，中國歷史將有大變化。對此，學界提出了「唐宋變革說」以統整相關過程的內容與意涵。⁵⁴此後世界秩序也生變化，藩鎮分地割據，漢人世界破碎，五代十國到達混亂高峰。西元 979 年，雖然宋朝統一了漢人世界，可是連鎖反應仍在進行，北族王朝趁勢而起。西元 916 年，契丹族迭剌部耶律阿保機（872-926）稱帝，建元神冊，契丹建國。西元 1038 年，党項族李元昊（1003-1048）稱帝，「大夏」建國。雖然遼夏兩國並無滅宋之意，其存在卻使宋朝感到莫大壓力。除了佔領幽燕與河西兩地而使宋朝邊防飽受威脅外，遼朝更是阻擾了宋朝主導國際秩序的理想。整體而言，漢人世界及其周邊的政治秩序也在「破片化」，空間上此狀將由漢人世界蔓延至周邊國際，時間上則持續至 13 世紀末。⁵⁵

⁵³ 王毓銓，〈明朝的配戶當差制〉，文收氏著，《王毓銓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下冊，頁793-824。

⁵⁴ 「唐宋變革說」的內容與學術價值的介紹，除前述引註諸家論說外，亦詳參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81（上海，2006.3），頁125-171。

⁵⁵ 安史之亂後的「破片化」格局，詳參張廣達，〈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唐宋變革之際的中原和北方〉，文收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第3冊（臺北：政大歷史學系等出版，2008），頁1-20。西元10至14世紀間的宋朝與周邊世界的互動，又見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所收諸文的討論。

「破片化」的局面，如果考量到漢人世界以外區域，其實單就實質統治狀況而言並非新穎，漢人世界及其周邊區域本常分立而治。不過如就互動關係與周邊諸國對於世界秩序的看法所見，西元 10 世紀以後的新局面卻有兩大特色，第一是北亞政權開始更加強勢地干預漢人世界，第二是在干預的過程中，漢人世界周遭諸國開始大量利用漢人觀念，或是穩固自身的獨立地位，或是奪取原有漢人世界專屬的國際秩序主導權。

首次登場的北族王朝是契丹。藉由中原混亂，契丹強勢介入中原政局，西元 938 年更以後晉割讓取得幽燕（或稱燕雲）地區。幽燕佔領的意義豐富，影響深遠。雖然幽燕地區一直是胡漢雜處之地，傳統認知中卻仍視為漢人世界的一部分，於是此舉也標示著立國北亞的北族王朝統治漢地的開始。另外，雖然人地規模不大，也屬漢地邊陲，幽燕地區卻為北族王朝南下的灘頭堡。契丹擴張在建國後 40 年將告一段落，西元 944 至 947 年之間的積極南下僅是插曲，遼太宗的失敗終使遼朝安於北亞世界，往後近兩百年，遼朝所佔漢人區域也僅幽燕一隅。契丹之後，後繼的北族王朝不斷南進，漢人世界佔領範圍日益擴大。身為漢人世界的代表，宋朝不斷地抵抗著北族王朝的進逼，只是北族王朝已非往昔可比，宋朝也是節節敗退，每波的新北族王朝興起總將帶出再次的宋朝潰縮。西元 1142 年，半壁江山正式為金所有，西元 1279 年，殘餘國土終究為元所收。對於西元 10 世紀以後的北族王朝，基於「征服」的型態，魏復古認為可稱這些政權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而五胡國家與北朝等政權則為「滲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至於漢人王朝便是「典型中國王朝」(*typically Chinese dynasties*)。⁵⁶此一分類自非完善，學界多有修正與質疑。⁵⁷例如雖

⁵⁶ Karl A. Wittfogel (魏復古) and Feng Chia-Sheng (馮家昇), *History of Chinese*

然魏復古認為契丹屬於「征服王朝」，但是考量幽燕並非征服所得，陶晉生便認為金朝方為第一個「征服王朝」。⁵⁸

契丹所建的遼朝（907-1125）、女真所建的金朝（1115-1234）、蒙古所建的元朝（1279-1368）、以及稍後滿州所建的清朝（1636-1912），前三個北族王朝逐步壓縮著漢人王朝的國際地位與統治空間，後兩個北族王朝加上之間的明朝，其興代更有「胡」漢輪治漢地之貌。北族勢盛之狀，20世紀初已為日本與中國的史家所注意。從日本學者桑原隲藏（1870-1931）將五代以後視為「漢族漸衰」時代開始，到回應桑原隲藏而另作中國時代劃分的傅斯年（1896-1950），所指出之南宋滅亡後「全為胡虜之運，雖其間明代光復故物，而為運終不長矣」等說法，皆是類似的觀察。⁵⁹此一「胡」運昌盛，金朝自有關鍵作用。金朝乃是西元 10 世紀以後，第一個立國北亞而後以武力侵略中國並統治漢人主要地區的北族政權。此一成果來自遼朝的準備，也為蒙元統治奠下基礎。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便認為，在內亞細亞軍事力量不斷南侵中國的過程中，如將遼金元三朝的興起視為一種連續狀態，則金朝佔有重要地位，關鍵在於金朝取得了統治中國心臟地帶的經驗。⁶⁰

Society: Liao (907-1125). pp. 24-25.

⁵⁷ 歷來的修正與質疑大致有三類：第一類為針對個別政權屬性歸類的調整，第二類是針對分類名詞及政權特徵關注重點的修正，第三類則是檢視「征服王論類」的運用範圍及立論合理性。

⁵⁸ 陶晉生，〈金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頁417-418。

⁵⁹ 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文收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傅孟真先生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52），第1冊，頁54-61。本文原刊於1918年4月17日至23日之《北京大學日刊》。

⁶⁰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臺北：正中書局，1994），頁122。

（二）天下觀的發展

北國強盛，宋人亦是深知，富弼（1004-1082）的〈河北守禦十二策〉，其前總評遼夏強盛原因與宋朝應有態度的論說，便是宋人理解當下變局的例證。其中富弼便明白指出，「二敵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⁶¹所言自需修正，遼夏及其餘北族王朝，連同軍事方面的整體國家建制實多本俗漢法並濟。然而富弼亦是道出關鍵，此時北族國家的整體國力已是強於過往，無論是人力物資的掌握、資源與訊息的傳輸、國家的控制力道等能耐皆是高度提升，具備本族風格的官僚化體制也已建置，新型的北族國家體制正式出現。

伴隨北族王朝不斷地擴張，漢人政權的國際地位也正遭受嚴重挑戰。在遼宋對峙而兩國各以盟約關係互相對應之時，對於自己的周邊，雙方也皆有各自的從屬範圍，此時天有二日。⁶²雖然歷史上的中國政權與周遭世界的關係，常為漢人王朝視為典範的朝貢制度的存在時間實是有限，盟約關係方是基調，不少宋朝君臣也能同意盟約關係適合宋遼往來，不過平等論交的情狀還是不斷刺激著許多宋人的觀感。稍後局勢更為惡化，金朝崛起後，除了國土淪陷，西元1142至1165年間，宋朝甚至一度向金朝稱臣進貢。在此瞬間，「列國體制」重回「天朝體制」，但天下之主已非故人。相關種種，宋人萌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也產生新型的世界秩序意識。相對於過去的模糊有彈性，包括國家、民族、文化等各層面

⁶¹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上海師範學院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50，頁3640-3641。

⁶² 宋遼關係，詳參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本書英文版書名主標題即為 *Two Sons of Heaven*。

的「我者」與「他者」，現在已需清晰的邊界方能安定自我的存在與價值。⁶³

當宋人正在鑿深鴻溝自保，北方朝野反以漢人觀念搭建連結北南的橋樑。就金朝而言，早自攻宋之初，金朝便已運用漢人語彙宣揚進取中原的正當性，政權合法性也逐步確立。⁶⁴中葉以後，金朝對於漢人概念的運用已臻成熟，運用範圍也從政治領域延伸至文化領域，從國際地位到歷史地位，「正統」、「德運」的討論因而興起。陶晉生便指出，世宗在位期間除了復興女真文化外，也對禮樂興作甚是用心，搭配著「我國家紆遼、宋主，據天下之正」之言，這或許是種建立正統的努力。⁶⁵章宗、宣宗兩朝的「德運」討論又為金朝確認自身地位的最盛期，從女真統治階層到漢人文士官員，他們透過不同的說法詮釋著心中的金朝地位。⁶⁶詮釋中，既建構出漢人觀感中合理的王朝面貌，也以漢人天下觀確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及歷史地位。此時，金朝也開始自視為「中國」。

學界大致同意金朝已以「中國」自居。⁶⁷金代的「中國」一語

⁶³ 宋代世界秩序意識新發展，詳參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11），第一編第一章〈「中國」意識在宋代的凸顯〉，頁41-65。

⁶⁴ 陶晉生，〈金代政權合法地位的建立〉，頁440-444，文收氏著，《宋遼金史論叢》，頁439-454。

⁶⁵ 陶晉生，〈金代政權合法地位的建立〉，頁450-451。金世宗之言，見元·脫脫，《金史》，卷28，〈禮一〉，頁694。

⁶⁶ Hoh-lam Chen（陳學霖），*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Jurchen-Chin Dynas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劉浦江，〈德運之爭與遼金王朝的正統性問題〉，文收氏著，《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頁1-26。另有宋德金兩文：〈遼朝正統觀念的形成與發展〉、〈正統觀與金代文化〉，兩文分收氏著，《遼金論稿》（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頁169-177、178-197。

⁶⁷ 較為全面的整理，詳參熊鳴琴，《金人「中國」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原有許多意涵，或是中原或漢人居地的代稱，或是中原或漢人文化相關事務的泛稱，或是中國歷代正統政權的統稱，有時則為金朝本身的自稱。金代朝野自視為「中國」的立論基礎或許有二，一是領有中原便可自稱「中國」，二是行中國法便可自稱「中國」。⁶⁸兩種觀點本有中原之國乃為中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等漢人傳統觀念的支持，加上確認了正統性後，金朝自認已是比肩中國歷代正統王朝，自視為「中國」更為順理成章。又在行中國法可為「中國」的觀點中，「中國」似乎成了一種政體形式的稱銜，此詞遂可不為漢人政權專屬。⁶⁹生於金、忠於蒙元的漢族士人郝經（1223-1275）曾對南宋官員道：「今日能用土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⁷⁰或因發於對宋場合，郝經強調了能為中國主的前提，也略為分殊了北族王朝與「中國」，但如身處本朝，相關論述又多不加前提，直接便稱本朝為「中國」。類似論述頗多，漢族士人與北族統治階層皆有抒發，整體約略構成了一種北方朝野的共識，也為漢族士人參與或認同北族王朝的基礎。目前所見，「中國」

⁶⁸ 金代「中國」語彙用法的分析，詳參王明蓀，〈南宋及金朝的「中國觀」〉，文收杭州社會科學院、浙江大學歷史系主編，《第三屆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頁8-24；趙永春，《從複數「中國」到單數「中國」——中國歷史疆域理論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第六章第二節〈金人對「中國」的認識〉，頁421-441。

⁶⁹ 甘懷貞曾經指出，歷史上的中國政權用以自稱的「中國」並非是一種專有名詞，「若用一個或許不是太恰當的比喻，這就好比現代國家以『民主共和國』自稱一般。這一詞是用來形容並界定自己政權的性質，而不是用來作為政體或國家的名稱」。詳參氏著，〈重新思考東亞王權與世界觀——以「天下」與「中國」為關鍵詞〉，頁43，文收同氏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頁1-51。

⁷⁰ 元·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1冊，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37，〈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頁11上。

之稱頗能協助金朝穩定漢地統治並提升自身地位。

(三) 北族世界與漢人世界的併融

本為漢人世界獨享的世界秩序詮釋語彙及觀念，北族王朝努力學習，此為征服漢地的高效工具，北族統治在漢人世界中的合法性也得完成。但過程中，反饋也在進行。首先，基於北族資源在漢地統治中的相對貧乏，加上欲為「中國」需先有其貌，即便北族統治階層盡力維持本族優越地位並意圖保持其主體性，然而還是無法避免仿效漢人文化。隨後，各種漢人元素背後的思維也將蘊染滲入，波及層面也漸蔓延，從政治管理到日常生活與菁英文化。就在漢人與北族彼此仿襲而使文化變遷呈現「涵化」(acculturation)景觀的同時，居於漢地的北族，仿襲漢人的勢態卻是日益提升。學界對於北族學習漢人之道的過程，或有將之整體稱為「漢化」(或「華化」, Sinicization)、「同化」(assimilation)，或有慮及北族主體性而以「儒化」(Confucianization)、「文明化」(civilization)、「士人化」(literatization)等用語具體探討個別領域的仿襲現象。⁷¹但無論如何，隨著時間前進，北族王朝更類漢人政權，不少北族也開始「宛然如漢家子」。⁷²相關情狀，金代頗為

⁷¹ 「文明化」說法，詳參前引 Peter K. Bol, "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儒化」說法，詳參 John W. Dardess, (賓德士),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士人化」說法，詳參蕭啟慶，〈論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漢化與士人化〉，文收氏著，《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頁55-84。結合新近討論而對「同化」、「漢化」的再詮釋，詳參陶晉生，〈同化的再思考〉，文收氏著，《宋遼金史論叢》，頁515-532。

⁷² 此語借自「宛然一漢家少年子」。據宋人記載，女真權貴曾以「宛然一漢家少年子」譏評金熙宗之過份漢化，詳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光緒三十四年許涵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66，頁6上。

明顯，也給元、清兩朝不少啟發。⁷³相對於其餘北族王朝，女真統治階層似乎較有意願進入中國世界，或透過漢法的承繼，或透過漢式觀念或語彙的使用，金朝的努力提升了整體北族王朝參與中國世界的程度。但在參與同時，北族也將被迫面對漢人文化的逆襲，一場維護本族主體意識與融入中國世界的拉鋸戰正在展開。⁷⁴

尚有第二種反饋。西元 10 世紀以後新興的北族王朝，由於繼續統治本族原居地，漢人元素也將影響本族原居地的發展。遼金時期，現今中國東北、內蒙一帶已有大量的築城與漢人移民活動，規模過往未見，一時蔚為盛況。⁷⁵就在北族王朝自視為「中國」的

⁷³ 不過這些啟發是否直接導致元、清兩朝更加用心推動強化本族主體意識的政策，目前尚難確認。蒙元與清朝對於金代歷史的省思，筆者學力有限，未見針對此一議題的研究，僅見劉浦江曾有論及，詳參氏著，〈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頁264-272，文收同氏著，《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頁235-273。

⁷⁴ 相關議題，清史學界討論甚是熱烈，部分代表論述已收於劉鳳雲、劉文鵬主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臺灣學界對於相關爭議的檢討，詳參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6（臺北，2006.12），頁154-190。中國學界對於美國論點的觀察，詳參黨為，《美國新清史三十年——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⁷⁵ 漢人北移，詳參陶晉生，〈遼金時期漢人的北遷〉，文收氏著，《宋遼金史論叢》，頁385-396。韓光輝，〈遼代中國北方人口的遷移及其社會影響〉，《北方文物》，1989：2（哈爾濱，1989.6），頁72-80。築城活動，王明蓀已有系列研究，詳參〈遼代草原城市的興起〉，《北方文化研究》，2010：1（首爾，2010.1），頁87-94；〈東北內蒙地區金代之政區及其城市發展〉，文收氏著《遼金元史論文稿》，頁221-249。相關研究仍在進行，下一步的觀察點也許是遼金時期北移的漢人與漢俗，能否於北方長期保持作用？抑或出現「土著化」（indigenization）的發展？不過，蒙元學界似乎未有相關研究，而明清研究中，以遼東為例，可見明清活躍於遼東的漢人勢族先世，最早已是元末以後移入。清初東北漢人勢族家世，詳參葉高樹，〈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頁122-139，文刊《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2（臺北，2009.12），頁121-196。漢人相關元素的北傳、擴散、綿延，似可繼續關注。

當下，「中國」也將吸納北族王朝乃至於北族世界，漢人世界的人、物、觀念將得更多北傳機會。此後「中國」開始「巨大化」，無論是實體或是概念都在擴張。在漢人力量重新崛起而「中國」一詞開始具備現代意涵之後，北族過往之自稱中國與沾染漢風，也被視為這些族群乃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證據，契丹、女真（滿州）、蒙古將被全盤或部分併入現代中國。現今中國的龐大版圖與多族成分，多少受益於此期的發展。⁷⁶西元 10 世紀以後的新局面，無法逕言金朝的存在乃是成形的關鍵，但卻可以同意金朝應有階段性的貢獻。最後，由於兩種反饋的存在，整體而言，金朝承先啟後的地位不僅存在於北族勢力南進的過程中，也在中國「巨大化」的過程中。

六、結語

金朝歷史的影響，最基礎的評估指標或有二。一是時間的觀察，有些金代現象僅能衝擊金朝統治當下，有些則能影響深遠。二是空間的觀察，有些衝擊僅及金朝治下，有些影響漢人世界，有些則廣及東部亞洲的歷史發展。目前所見，能對後世影響深遠的金代發展大致有三種，一是對中國政治運作方式的改造，二是對中國人文活動空間格局的形塑，三是對北亞與漢人世界交流的推進。這些影響的產生，金朝統治的作用不一。有者受到金朝統治的直接誘發，如政治方面的改造多為此類；有者與金朝統治無直接相關，但因戰亂的干擾與統治當下所造就的漢人世界分裂環境而得現形，如北南經濟落差的加劇、各種古舊風氣的再興及延

⁷⁶ 杉山正明著，烏蘭、烏日娜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8-11。

續；有者似與金朝統治關係不大，如雜劇創作、新道教、中醫新流派等金代三大漢人新型文化活動，其興盛當有自身脈絡可循，也不易確認金朝統治是否延遲或推進了相關現象的出現。

稍後，各方面影響的持續程度，常需配合該領域所處的環境條件。金亡之後將由蒙元、明、清接續統治中國。由於蒙元、滿清皆為北族王朝，雖與金朝相較，兩代之建國形式、時空背景皆有不同，其具體統治手法也需配合調整，但因統治漢地所需面對的情境類似，如均要建立有效管理漢地的體制，也均要處理本族文化與漢人文化的取捨，金朝的統治原則也將啟發元清兩代的漢地統治策略。另外，元朝以後的中國南北將進入長期統一的階段，此使因為北南分治而興盛的金代現象獲得了與南方交流的機會，或得散播，或因南方元素的北傳而變異或消散。最後，比起對於中國歷史的影響，受到了史料相對有限與現代政治情勢的侷限，金朝統治或金代現象對於北亞世界及其與漢人世界的關係的影響，較難精確評估。但就宏觀趨勢而言，金朝應在北族勢力南進與中國「巨大化」的過程中具備著承先啟後的地位。

本文原欲針對金史而論，但因涉及金代現象的定位，不免旁附牽連。此時可見許多金代現象的後續發展及歷史意義，仍須透過其他時段各種專題的研究方能論斷，如金元新制對於明清的影響、北族王朝統治與華北社會各種現象的變與常之間的關係、北族王朝與漢人世界互動密切對於北亞世界的衝擊等。這些議題，學界正在積極討論，新視野因此提出，許多過往未得注意的現象也獲重視。後續成果，宜可關注。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上海師範學院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光緒三十四年許涵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張棣著，傅朗云輯注，《金虜圖經》，書收李樹田主編，《金史輯佚》，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 金·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 元·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1 冊，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萬有文庫十通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元·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

二、專著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百年明史論著目錄》，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
- 方建新編，《二十世紀宋史研究論著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 王明蓀，《含英咀華：遼金元時代北族的漢學》，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2。
- 王曾瑜，《遼金軍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1。
- 王毓銓，《王毓銓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王德朋，《金代商業經濟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外山軍治著，李東源譯，《金朝史研究》，牡丹江：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8。
- 甘懷真主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
- 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遼宋金元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 吳松弟，《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 宋德金，《遼金論稿》，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 宋德金、史金波，《中國風俗通史：遼金西夏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 杉山正明著，烏蘭、烏日娜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 李治安，《元史暨中古史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屈文軍，《遼西夏金元史十五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伊藤道治等著，吳密察等譯，《中國通史》，臺北：稻鄉出版社，1990。
- 邱添生，《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 胡戟等編，《二十世紀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 夏宇旭，《金代契丹人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 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明文書局，1996 修訂四版。
- 高橋弘臣著，林松濤譯，《宋金元貨幣史研究——元朝貨幣政策之形成過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張博泉，《金史論稿》，第 2 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 陳高華，《元大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 陳高華、史衛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 陶晉生，《宋遼金史論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13。
-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84。
- 陶晉生，《邊疆史論集——宋金時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 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傅孟真先生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52。
- 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編，史衛民等譯，陳高華等審稿，《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907-1368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 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臺北：正中書局，1994。
-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11。
- 葛金芳，《宋遼夏金經濟探研》，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
- 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濟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8。
- 熊鳴琴，《金人「中國」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趙永春，《從複數「中國」到單數「中國」——中國歷史疆域理論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
- 劉浦江，《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劉浦江，《遼金史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 劉浦江編，《二十世紀遼金史論著目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3。

劉鳳雲、劉文鵬主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蕭啟慶，《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1999。

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8。

韓茂莉，《遼金農業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黨為，《美國新清史三十年——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Chen, Hoh-lam (陳學霖),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Jurchen-Chin Dynas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Dardess, John W. (竇德士),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Rossabi, Morris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Wittfogel, Karl A. (魏復古) and Feng, Chia-Sheng (馮家昇),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三、論文

內藤湖南著，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文收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0-18。

王明蓀，〈南宋及金朝的「中國觀」〉，文收杭州社會科學院、浙江大學歷史系主編，《第三屆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

- 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頁 8-24。
- 王明蓀，〈遼代草原城市的興起〉，《北方文化研究》，2010：1（首爾：檀國大學校北方文化研究所，2010.1），頁 87-94。
- 王曾瑜，〈金熙宗「頒行官制」考辨〉，文收姜錫東、李華瑞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 6 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5，頁 286-295。
- 田浩（Hoyt C. Tillman），〈金代儒教：道學在北部中國的印跡〉，文收中國哲學編輯部編，《中國哲學》，第 14 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頁 107-141。
- 吉川幸次郎，〈朱子學北傳前史：金朝と朱子學〉，文收宇野哲人先生白壽祝賀紀念會編，《宇野哲人先生白壽祝賀紀念東洋學論叢》，東京：宇野哲人白壽祝賀紀念會，1974，頁 1237-1258。
- 余蔚，〈完顏亮遷都燕京與金朝的北境危機——金代遷都所涉之政治地理問題〉，《文史哲》，2013：5（濟南，2013.10），頁 124-139。
- 吳鳳霞，〈金代尚書省若干問題探討〉，文收于志耿、王可賓主編，《遼金史論集》，第 8 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頁 206-216。
- 周良霄，〈程朱理學在南宋、金、元時期的傳播及其統治地位的確定〉，文收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文史》，第 37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139-168。
- 邱添生，〈論「唐宋變革期」的歷史意義——以政治、社會、經濟之演變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7（臺北，1979.5），頁 83-111。
- 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文收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217-224。
- 姚大力，〈論蒙元王朝的皇權〉，文收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

- 第 15 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頁 282-341。
- 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81（上海，2006.3），頁 125-171。
- 徐秉愉，〈從「內地」到「邊區」——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變化〉，《臺大歷史學報》，39（臺北，2007.6），頁 185-232。
- 徐敏，〈《百年明史論著目錄》編後記〉，《中國史研究動態》，2013：5（北京，2013.10），頁 95-96。
- 張中政，〈漢兒、簽軍與金朝的民族等級〉，《社會科學輯刊》，1983：3（瀋陽，1986.6），頁 99-102。
- 張博泉，〈金史的研究與思考〉，文收張志立、王宏剛主編，《東北亞歷史與文化：慶祝孫進己先生六十誕辰文集》，瀋陽：遼瀋書社，1991，頁 438-444。
-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文收鄧小南、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11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5-71。
- 張廣達，〈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唐宋變革之際的中原和北方〉，文收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第 3 冊，臺北：政大歷史學系等出版，2008，頁 1-20。
- 閻興潘，〈論金代的「諸色人」——金代民族歧視制度化趨勢及其影響〉，《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9：4（臨汾，2012.7），頁 62-66。
- 陳昭揚，〈金代漢族士人的地域分布——以政治參與為中心的考察〉，《漢學研究》，26：1（臺北，2008.3），頁 103-135。
- 陳述，〈遼金兩朝在祖國歷史上的地位〉，文收同氏主編，《遼金史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序頁 1-9。
- 陶晉生，〈金代的政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41：4（臺北，1969.12），頁 567-593。

陶晉生，〈金代的政治衝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3：1（臺北，1971.6），頁 135-161。

楊保隆，〈試談金代廢除勃極烈制度的最初動因〉，《社會科學戰線》，1994：1（長春，1994.2），頁 185-192。

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6（臺北，2006.12），頁 154-190。

葉高樹，〈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2（臺北，2009.12），頁 121-196。

韓光輝，〈遼代中國北方人口的遷移及其社會影響〉，《北方文物》，1989：2（哈爾濱，1989.6），頁 72-80。

魏崇武，〈金代理學發展初探〉，《歷史研究》，2000：3（北京，2000.6），頁 31-44。